

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

□ 田仲勋

摘 要: 大跃进运动研究是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海外的研究比大陆学者起步早、范围广,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了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在西方语境中产生的学术成果,既为学界提供了知识增量,同时由于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深受英语学界当代中国研究范式的影响,因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

关键词: 当代中国政治 大跃进运动研究 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 D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243(2011)05-0091-05

一、大跃进运动研究的三个阶段

海外大跃进运动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末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受西方世界冷战思维和学术界古典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非常明显;9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多以新制度主义作为其指导范式;第三阶段是90年代末至今,比较历史分析模式主导了这一新阶段的大跃进运动研究。

(一) 古典制度主义范式阴影下的大跃进运动研究(1960至80年代末)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有海外学者开始关注大跃进运动,理查德·鲍姆(Richard·D·Baum)1964年的文章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的政治社会基础。^[1]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大跃进运动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视角始终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当代中

国政治研究范式的发展和转换密切相关。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尽管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毛时代的结束,冷战造成的东西方紧张对峙的关系得到了缓解和改善,但冷战思维依然对学术界的研究有着惯性的影响,因此这一阶段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流范式依然受古典制度主义范式(又称“极权主义”或者“集权主义”)所左右,其典型特点是始终把新中国看作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对立面,强调其政权组织形式的集权化。

这种在冷战时代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运作下产生的研究范式,使得西方学者更偏好于将研究的兴趣点放在大跃进运动的直接后果上,即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的肇因以及大跃进后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据。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在1984年就撰文论述了粮食统购与饥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粮食的过量统购。^[2]而粮食过量统购的背后矗立着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不过这一观点在十数年后受到

作者:田仲勋,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邮编730070。

* 本文所列的学术成果既包括以西文为母语的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在西方的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外文著作已有译著者,引文采用译著译文。

了杨大力、陈意新等人的质疑,他们在对饥荒相对严重程度的省际差异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与伯恩斯坦完全不同的观点。

在大跃进运动研究中,古典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指导下的研究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国内读者最为熟悉的首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二卷 大跃进》。麦克法夸尔教授在这本著作中根据他所能掌握的大量历史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等许多方面,详细地考察了 1956—1960 年间中国的历史进程,指出了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起源之间的深刻的关系,^[3]这本书以及 1980 年代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史》(专辟两章来阐述大跃进运动)都强调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中的独特作用,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是“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延续,是“文革”的源头。^[4]

1987 年,荷兰学者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出版的《幻想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与大跃进》(Saltationist Socialism: Mao Zedong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也是研究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力作。这本著作着重分析了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思想演变过程,认为大跃进的发动并不是理性决策的结果,而是毛泽东个人愿望与激情的产物^[5]。沈迈克的研究依然没有摆脱极权主义范式的束缚。

(二) 新的研究途径探索(1980 至 90 年代末)

极权主义范式尽管是上世纪后半叶西方特别是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流范式,但在大跃进运动研究领域,始终有学者尝试突破这一研究框架,尝试新的研究路径。早在 1978 年,张旭成(Parris H. Chang)就从精英冲突论的途径去研究大跃进运动的起源,否定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问题上彼此意见一致的观点。^[6] PP190-196 随后又有法国学者杜明(Jean-Luc Domenach)尝试利用个案研究来分析大跃进运动的内部机制。杜明通过对河南省大跃进运动的深入考察,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地方政府在运动发动和控制阶段的两面性、党群关系运作逻辑的矛盾等促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在 1957 年夏季的总爆发,并最终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7]

这一时期,学者巴赫曼(David Bachman)、贝克

(Jasper Becker)、杨大力(Dali Yang)、福斯特(Keith Forster)、泰伟斯(Frederick C. Teiwes)、孙万国(Warren Sun)、陈钟礼(Alfred L. Chan)等人都曾经尝试从新的研究途径对大跃进运动做出更深入的探讨。巴赫曼认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不仅为认识大跃进运动的起源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并且它也是研究毛时代和后毛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他利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导致大跃进的经济政策,强调了官僚体制在大跃进运动发动中的作用,分析了大跃进运动的制度根源。针对西方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大跃进是由于“毛泽东的天真和对 1956 年到 1957 年的一系列温和的改革措施完全拒绝所导致”的观点,巴赫曼对大跃进的起源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强调官僚体制的巨大影响,大跃进的发生绝不能视为“毛泽东挂帅”的结果,其本质应该是官僚联盟利益冲突下的产物。因为毛泽东和其他的最高领导人很大程度上不懂经济事务,因此在经济发展政策上别无选择,加上当时财经统一工作的失败,使得毛等中央领导只能听任官僚机构的摆布。^[8]

不过,巴赫曼的观点受到了泰伟斯的批评,他和孙万国都更加强调中央官僚、地方领导和毛泽东之间的对抗与合作关系。泰伟斯认为巴赫曼低估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在当时中国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过分夸大了官僚利益集团的作用。泰伟斯指出,当时的中共中央有两种政治,以毛泽东为首的“核心”(inner-court)政治和地方层级的“外围”(outer-court)政治。在此基础上,他划分出两个联盟,一个是毛泽东和赞成大跃进路线的中央领导、地方官员的结盟,形成了“支出(spending)联盟”,另一个是反对该路线的中央部分官僚组成的“协调(coordinating)联盟”。而在这两个联盟斗争中,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形成的“支出联盟”,通过毛泽东个人所固有的权威和掌握的“实践意识形态”,在与“协调联盟”矛盾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因此才得以顺利发动大跃进运动。^[9]陈钟礼的观点与泰伟斯比较趋同,也认为不能忽视毛泽东的影响。他在综合了以往的大跃进研究的基础上,以广东、辽宁为个案对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0]值得一提的是,泰伟斯和孙万国的研究,除了利用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以外,还有大量的口述和

对时任地方官员访谈资料,这在海外的研究著作中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福斯特以浙江省为个案,通过对大跃进时期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省长沙文汉等地方领导人之间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纠葛,以及他们与中央的关系,全面分析了大跃进运动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复杂的博弈关系。^[11]这是第一次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一视角来关注地方大跃进运动激进程度差异背后的体制因素。

这一时期还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大跃进运动与其灾难性后果之间的关系,马玉英(An. Mark Yuying)、李伟(Li. Wei)和杨涛(Dennis Tao Yang.)三位学者认为,大跃进运动最终导致了全国性的农业歉收和大面积的饥荒,这一后果标志着新中国建国初期以苏联为榜样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运作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于集体化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期望过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时间表。结果导致大量的农业资源被强制地转移到工业生产领域,导致农民负担过重和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加上集体化运动中遗留的弊端,最终导致了三年饥荒的发生,而饥荒又反过来加剧了生产能力的下降和农业的进一步减产。^[12]

在西方研究大跃进运动的学术群体中,贝克(Jasper Becker)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贝克是英国人,在北京当记者多年,所以他的作品既有新闻报道的具体生动感性的特质,又有学术性著作注重历史和理论分析的长处。贝克的《饿鬼》主要描写了三年饥荒并探讨了大饥荒的成因。他认为大饥荒的成因在于毛泽东沿用斯大林的做法,国家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将购销差价积累的资金,大量地投入到重工业部门,通过这种农业补贴工业的方式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以达到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目的。^[13]为此,贝克还专门比较了斯大林统治下的三十年代数百万乌克兰人饿死的大饥荒,并指出中国大跃进后期所发生的农业饥荒的起因与苏联历史上的饥荒类似,尽管这一观点随后便受到海内外诸多学者的质疑,但是贝克的著作在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中依然具有知识推进的意义。他的著作中除了大量的二手材料外,自己还做了大量的采访调查,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素材。

(三)历史和比较视野中的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1990年代末以来)

近年来,比较历史分析的模式被广泛地运用在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杨大力、陈意新等人。杨大力最先质疑了贝克关于大饥荒起因的说法,他不赞同贝克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和乌克兰饥荒时期的斯大林不同,他没有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农民饿死的消息,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杨大力认为大跃进时期那些政策措施更为激进、灾难更为严重的省份的官员中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politics of loyalty compensation)”,即下级官僚迫于政治压力或者为了获得提拔,会争相以“比革命导师更革命”的姿态向中央表示忠诚。^[14]杨大力指出“我们认为,那些党员少的地区(以人均基础计算)比党员多的地区更倾向采取激进措施。这种情况更被另一个事实加强,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时,那些共产党占领较晚的地区更可能由非本地人管治,这使得本地人更急于表现他们的忠诚和革命热情。因而,共产党占领较晚的地区一般比革命血统纯正的老根据地更可能倾向于激进”。^[15]饥荒相对严重程度的省际差异一直是困扰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学界的一个重大议题,杨大力教授的研究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不过,这个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即使如杨大力教授所言,这个结论得到了统计分析的支持,但杨大力论述中存在的问题是,他没有注意到在这些由“非本地人管治”的地区中,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矛盾斗争,没有注意到1958年初各省开展反地方主义运动的情况,而这些状况与大跃进运动的激进措施和饥荒相对严重程度的省际差异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陈意新教授的比较研究是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他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大跃进/大饥荒中安徽和江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作了微观的比较分析:这两个省的地域人口相似,但前者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3万,而后者却只有18万。陈意新教授的问题意识是: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省际之间的死亡率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他的研究表明: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安徽建立了“专制型领导权”,他缺乏地方联系,他的政治激进主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江西的杨尚奎、

邵式平、方志纯等人非但建立了一个“合作型的领导权”，还通过“紧密的地方联系”及时了解了基层的实际情况，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救灾措施，这是导致两省饥荒相对严重程度出现巨大差异的最关键的因素。^[16]可以说，陈意新教授的论述，已经触及到了本地籍干部与非本地籍干部之间的关系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影响和作用。但是无论是曾希圣的“专制型领导权”还是杨尚奎的“合作型领导权”，作者都没有追寻这种地方领导结构差异的更加深刻的原因，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二、现有研究的问题和不足

既有的关于大跃进运动研究的著作很多，以上仅仅作了一个简要介绍，罗列了其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和专著。应该说，海外的大跃进运动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有开创性的成果，尤其是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走在国内学者的前面。不过，现有的研究同时也存在着问题和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既有研究范式的局限。尽管海外从事大跃进运动研究的学者在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新的理论成果方面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但是依然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海外大跃进运动的研究尽管在研究的范式上没有固定的模式，也很重视微观机制分析，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相当一部分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始终把当代中国政治作为民主政治的反面教材来看。有了这样一个先入之见，在很多问题上难免陷入纯粹的西方视野或者叫做西方式的“东方想像”，这是一种化约论的倾向，即将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西方中心论”取向生搬硬套在中国研究上。也正是因为如此，即便是当下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其很多学术著作依然带有“极权主义”模式的阴影。所以，有些学者呼吁要以“中国中心主义”来主导中国研究，要以中国内在的政治、经济机制去理解中国的历史，以及从中共的中央与地方长期的互动关系去理解中共政治经济的发展，^{[2] (P33)} 这样的呼吁并不是空穴来风。

其次，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的过程中，一直以来眼光朝上，过于关注高层政治，以至于在研究农村大跃进、公共食堂和大饥荒等主要发生在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变化的时候，依然用研究高层政治的老一套来看待基层政治，没有注意到基层政治结构

并不是对高层政治结构的一种简单复制，它们之间依然是有区别的。在透视基层政治尤其是农村基层政治的时候，必须要有历史感和现场感，而不是仅仅依靠统计分析在假设和结论之间架起一座表象一致的桥梁。

第三，是资料利用上的缺陷，口述和档案资料利用较少。相对于大陆学者所钟爱的宏大叙事风格而言，海外学者在中观和微观的个案研究上走到了前面，尤其是以省为个案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作品。这种成功受益于海外学者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中所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不可否认，统计分析的方法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有着实证主义传统的海外学者比较偏好的一种研究方法。与纯粹的档案文献分析这样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统计分析的方法在很多时候更加容易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在学科的知识增量上也容易取得较大的推进。但是，要取得这样的成果，必须拥有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作为海外学者，由于其在研究存在着进入现场的实际困难，许多情况下无法查阅原始档案，同时又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无法进行深入有效的田野工作，拿不到可靠的深度访谈的材料，因此，他们往往只能以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和统计年鉴来作为分析的依据，这些资料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因素，其中充满了不真实的材料，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状况，在这样的材料基础上进行的统计分析，其研究结果很容易出现偏差，这是大部分海外学者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所面临的共同的困境。

三、未来的研究取向

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其他议题相似，在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中，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志趣差异较大，大体来说，国内学者擅长或者偏好宏大叙事，而海外学者则更加注重个案讨论、比较分析，喜欢从微观分析的角度去钻研问题，这种差别存在的根源在于海内外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所承袭的不同的学术传统。纵观海外大跃进运动的学术成果，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统计分析是海外研究成果的主要特色。海外学者的个案研究，涉及了诸如广东、浙江、辽宁、河南、安徽、江西等多个省份，与国内学者相比而言已经是蔚为大观了。不过考虑到西方学术界的实证主义传统和对民族志研究路径的偏好，要想在大跃进

运动研究领域更为深入地拓展,必须具有更加微观的分析取向。与省级个案比较研究相比,县级或者乡级大跃进运动的个案分析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而大跃进运动最为庞大的直接推动者是县乡两级干部,可以说,要想全面深入分析大跃进运动发生发展的微观机制,离开对于县乡两级政权政治的分析是不可能的。因此,把分析的个案目标与县乡两级政治挂起钩来,这或许会成为今后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走出困境和误区的有效途径。

此外,为了沟通海内外学术界,做到研究工作中的取长补短、互相促进,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尝试。一是国内可以适当地向海外学者开放档案资料。历史问题的研究,先进的科学理论工具固然重要,但对各种史料尤其是档案材料的研究依然是最佳途径之一。目前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的学者在利用历史档案方面依然有着很多的障碍,这不利于海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继续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利用公开发表的报纸、方志和其他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其论证的过程显得非常“科学”,但有时也会与历史档案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事实不符甚至相互矛盾。二是开展海内外同行之间的合作研究,进行高层次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国内学者在历史档案资料的占有、进入现场的便利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而有着实证主义传统的西方学术界拥有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分析手段,二者的合作定会开启一个大跃进运动研究的新局面。

参 考 文 献

- [1] Richard D. Baum “Red and Expert”: The Politico -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J] Asian Survey, Vol. 4, No. 9 (Sep. ,1964) , pp. 1048 - 1057.
- [2] Thoms P. Bernstein,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J].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3, No. 3, Special Issue on China (May, 1984) .
- [3]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 [M].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 [4]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 年 [M]. 王建朗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5] Michael Schoenhals, Saltationist Socialism: Mao Zedong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M]. Foereningen foer Orientaliska Studier, Stockholm, 1987.
- [6] Parris H. Chang, 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 [M].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78.
- [7] Jean - Luc. Domenach, Trans. A. M. Berrett. :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ase of One Chinese Province, [M].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95.
- [8]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9] Frederick. C. Teiwes, with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 Mao, Central Politician,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 - 1959, [M].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 [10] Alfred L. Chan, Mao's Crusades: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fred L. Chan, The Campaig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 Study of Policy -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Liaon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9. (Mar. ,1992) , pp. 52 - 71.
- [11] Forster, Keith: Localism, Central Policy, and the Provincial Purges,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 ,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M]. Armonk : New York Sharpe, 1997.
- [12] An. Mark Yuying, Wei Li. and Dennis Tao Yang. , China's great leap? : forward or back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 No 2824, CEPR Discussion Papers from C. E. P. R. Discussion Papers, June 2001. 亦见 Wei Li, Dennis Tao Yang. ,The China's great leap: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vol. 113, no. 4
- [13] Jasper Becker :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 [14] Dail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M]. California: Stand -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5] 杨大力. 大跃进与当代中国 [J]. 二十一世纪(香港), 1998(8).
- [16] 陈意新. 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及饥荒的比较研究 [J]. 当代中国研究 2009(1).

(责任编辑:黄俊尧)